

东亚经纬

2014年第1期

【本期要目】

- ◆中国为什么要研究东亚（王勇）1
- ◆俄日岛屿争端探析（聂友军、张桂荣）4
- ◆明朝的御倭赏格（郑洁西）13
- ◆《崔溥〈漂海录〉评注》注释指瑕一则（张新朋）26
- ◆通知公告28
- ◆本院动态31

中国为什么要研究东亚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王勇

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我国周边国家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通过走“共同发展”的道路，“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中，东亚无疑是重中之重。因此，开展东亚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战略意义。

1. 东亚世界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持续惠及周边诸国，约在隋唐时期形成东亚文化圈，以汉字为媒介的儒释二教、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乃至文物器皿、风俗习惯等，辐射融合至周边各国，营造出一个“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和谐汉文化世界。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共同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东亚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充满敬意。因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构面向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传统文化是个不可替代的历史基础，有必要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之力度。

2. 东亚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和谐的东亚文化圈，促进区域文明长期繁荣；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势力介入下渐趋式微。目前随着全球化进程日新月异，区域内多国合

作形成某些联盟成为世界发展趋势，东亚散沙一盘已不合时宜，以致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合作过程中出现“小马拉大车”现象。东亚各国在文化上拥有共同遗产，在经济上优势互补且利益相关，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梦”，架构东亚共同体，不仅具有坚实基础，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09年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得到中、韩政府积极响应。为了在学术理念、愿景擘画中争取更大的主动权，我们有必要追溯古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机制、剖析近代东亚文化圈的解体原因、预测未来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模式。

3. 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已是学术界共识

在学术研究领域，从传统的国别研究（点），过渡到比较研究或交流研究（线），再发展到区域研究（面），已成为国际上学术发展的大势。纵观欧美诸国名校与科研机构，多将东亚视作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设立诸如东亚系、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院等。再看周边国家，日本学者最早提出“东亚册封体系”、“东亚贸易圈”等学术概念，2008年关西大学首创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东亚文化交涉学”国家基地；韩国方面也急起直追，冠名“东亚”的研究机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2009年韩裔财团出巨资在日本创立“One Asia Foundation”，迄今已在16个国家和地区的106所大学设立“亚洲一体化”讲座。因此，将东亚诸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已迫在眉睫，是与世界接轨对话的必然途径。

4. “东亚学”是一门创新学科

近些年来，“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我国逐渐兴起。在此过程中，由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主导的“欧洲学”，由浙江师范

大学开拓的“非洲学”，可谓独辟蹊径，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交叉学科。目前，整合东亚研究的积淀与资源，创建“东亚学”学科势在必行，这门创新学科具有以下特点：

（1）拥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与丰富的知识储备；

（2）海外在该领域尚无重要建树之前，先行确立中国范式，引领国际学术发展潮流；

（3）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理论创新价值；

（4）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理论创新意义。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积极推行“中国文化走出去”项目，历史上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影响、融合、创新，可谓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因此，东亚研究可为我国目前及未来的文化大国战略，提供诸国经验与教训。

俄日岛屿争端探析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聂友军、张桂荣

前言

由于日本坚持所谓“国有化”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从而将中日关系引向新的低谷。此外，日本与韩国存在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之争，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俄语：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也存在主权争端。日本称南千岛群岛为“北方领土”、“北方地域”或“北方四岛”，在名义上将其划归北海道根室振兴局，并一直向俄罗斯要求归还该岛屿。

在中国，从平面媒体到网络论坛，甚至包括部分中小学教科书和一些专家学者的论述，在提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端的岛屿时，往往习惯上不正确地沿用日本“北方四岛”的说法。古语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代处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时也讲求对等原则，如果我们不希望俄罗斯的媒体与民众以“尖阁列岛”指称钓鱼岛，那么我们需要及早放弃这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指称方式。即便我们在俄日领土争端中倾向于不持特定立场，那么确立以“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标准方式指称该争议领土是比较恰当的。

事实上，南千岛群岛与库页岛一样，原属中国固有领土。南千岛群岛在唐代就属于中国管辖，在黑水都督府的窟说部治下¹，之后则处在中国的辽、金、元、明、清等不同朝代的有效管辖之下²。近代俄国与日本

¹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11—12页。

² 参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第41—42，

都曾以非常不光彩的手段染指中国领土，彼此争夺不休，对南千岛群岛的占有一度是俄、日两国在东北亚进行地域政治博弈的战利品。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日本与俄罗斯的所谓领土争端，实际上是以不体面的方式坚持各自在帝国时代侵略扩张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一、争议岛屿概况

南千岛群岛是太平洋西北部的千岛群岛向南延伸部分，北接鄂霍次克海，东北面濒择捉海峡，西南隔根室海峡与北海道相望，西边是库页岛（俄称萨哈林岛，日称桦太岛），包括大小 30 多个岛屿，总面积 5038.33 平方公里，具体包括伊图鲁普岛（俄语：Итуруп，日本称择捉岛）、库纳施尔岛（俄语：Кунашир，日本称国后岛）、施科坦岛（俄语：Шикотан，日本称色丹岛）和赫巴马伊群岛（俄语：Хабомай，日本称齿舞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岛屿先在苏联、后在俄罗斯联邦的管辖之下。南千岛群岛总面积占俄罗斯领土的 0.029%，但却关系着俄罗斯的兴衰。

在自然资源方面，南千岛群岛植物种类繁多，是鸟类的天堂；渔业发达，水产丰富，是世界上三大著名渔场之一；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和商业矿石的储备相当丰富，探明的或正在开采的矿产有金、银、铜、铝土、硫磺等 200 余种，并有世界上唯一一座稀有金属铼矿。据专家估算，南千岛群岛及其大陆架总资源估值约 500 亿美元。¹

经济贸易方面，南千岛群岛拥有对发展经济贸易至关重要的出海口与“黄金水道”，从那里可以自由出入北太平洋，往返于堪察加、楚科奇及北美各口岸。以南千岛群岛为窗口，可贯通与中、日、韩、美等国经贸联系，一旦得到发展，对俄罗斯远东与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

军事战略方面，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要地。南千岛

51—52, 61—62, 71—72, 99—100 页。

¹ 俄罗斯《观点报》2010 年 2 月 7 日报道。

群岛作为出海口距西伯利亚铁路最近，距日本海也最近，离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两大城市也比较近，战略纵深的腹地广阔。南千岛群岛犹如多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可以成为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重要根据地，并便利地提供各种补给。

地缘政治方面，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对日本进行竞争博弈的重要战略平台。南千岛群岛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基地库页岛（俄称萨哈林岛）的南端遥相呼应，可有效钳制日本战略扩张空间，又与哈巴罗夫斯克的滨海区形成犄角之势，完全封闭日本进入鄂霍次克海的各条通道，十分适合俄罗斯在远东牵制日本战略要求。

对日本而言，南千岛群岛的战略地位同样重要。如果南千岛群岛归日本所有，不仅深受国土狭小拥挤之困的现状可以有所舒缓，而且可以将国境线与边防大大向北推进。地理上的特点可使南千岛群岛成为屏护日本北端北海道安全的重要保障。如果南千岛群岛归日本所有，俄罗斯的太平洋出口将被封死，俄罗斯远东地区面向世界的大门也将随之被关闭。

二、历史上的纠葛

俄日岛屿争端形成于“二战”末期，但其源头可追溯至历史上沙俄和日本之间的领土纠葛。虽然当代的俄日“争议领土”仅指南千岛群岛，但历史上两国在这片海域争夺的领土包括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当俄日早期扩张势力在此地迎头相撞后，它们就因领土问题屡起争端。

1594年沙俄在塔腊建军事城堡，以此为开端，开始有计划地分两路¹入侵中国的北方领土。1686年9月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以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为界，再沿外兴安岭向东直到海边，河东岭南归中国，河西岭北归俄国。准此，南千岛群岛仍属于中国清朝的管辖范围。

清军对俄军的雅克萨之战与《尼布楚条约》暂时挡住了沙俄军队对

¹ 一路南侵准噶尔，另一路东侵布里亚特蒙古。

中国大兴安岭以南和黑龙江流域领土的侵略后，沙俄侵略军转向东北，于1697—1698年侵占堪察加半岛。自1710年以来的20多年中，俄国人从堪察加半岛东岸先后获得10多名从日本因遇海上风暴漂流来的日本人，并将他们做为俄国人的日语教师和俄军侵入千岛群岛的引路人与翻译。

俄罗斯和日本一直各执一词，都强调是自己最先发现和开发了“南千岛群岛”。据史料记载，日本最早于1635年进入该部分岛屿所在地区。管辖“北方四岛”上阿伊努人的是隶属于日本中央政权的松前藩，藩主村上广仪登北方诸岛巡察后，开始正式经营这些岛屿。1644年，日本德川幕府根据松前藩献给幕府的地图绘成正式全国地图“正保御国绘图”，日本称其为世界上记录“北方四岛”的最古老的地图。

前苏联与俄罗斯历来强调俄国人是千岛群岛的第一发现者和开发者，以此证明对南千岛群岛的所属权。沙俄1691年宣称“发现”了堪察加半岛以南海域的这些岛屿，并取名为千岛群岛。此后两百多年里，沙俄与日本为争夺千岛群岛、库页岛及周边海域的权益进行了多轮较量，签订了数个条约及协议。

自1801年起，德川幕府驻兵100名于择捉岛，并立下“天长地久大日本属岛”的标志。1805—1813年间，俄国在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同日本人进行了8年鏖战，日本人称之为“北寇八年”。1855年双方签署了《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又称《下田条约》），约定整个千岛群岛以得抚岛为界，以南归日本，以北归俄罗斯。日本先后在南千岛群岛设置行政区，由此确定了日本对“南千岛群岛”的占有关系。

1905年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将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的控制权转让给日本。1941年11月，日本海军把其核心海上力量集结在伊图鲁普岛的单冠湾，然后从这里出发偷袭了美国海军据点夏威夷珍珠港。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晤并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千岛群岛须交予

苏联”。¹这些是苏联保证在欧洲战场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在日本投降后，苏联即依据《雅尔塔协定》宣布拥有该地主权并出兵占领了南千岛群岛。1946年2月，苏联将千岛群岛编入其地方行政区划，由南萨哈林州管辖，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南千岛群岛的占有。

1955年前后，日本在与苏联进行复交谈判的过程中首次提出“归还北方四岛”的问题，从而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战后苏日、俄日领土争端。1956年10月，两国签署《共同宣言》，由于当时两国对南千岛群岛的主权问题无法达成共识，第九条仅规定：“苏联同意把赫巴马伊群岛（齿舞群岛）和施科坦岛（色丹岛）移交还给日本。但前提是苏日签订和平条约后，再把两岛交给日本”。但因日苏和平条约一致未能达成，因此两岛的移交问题也无结果。

三、争端新进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对南千岛群岛的控制权，苏日领土问题转变为俄日领土问题，双方对争议领土的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俄日危机反而由于领土纠纷屡次爆发。

1981年，日本内阁通过每年2月7日为北方领土日，是为纪念1855年同日《日俄和亲通好条约》签订而设的。2009年7月3日，日本参议院通过《促进北方领土问题解决特别法》修正案，明确记载“北方领土为我国固有领土”，明确赋予日本拥有南千岛群岛主权的法源依据。俄罗斯批评法案内容不当，并拒绝承认日本的一切声明。

2004年俄罗斯决定归还较小的赫巴马伊群岛和施科坦岛，日本以此两岛占争议地区领土面积不足7%而拒绝²。2006年8月16日，俄罗斯巡逻艇向接近争议地区的日本渔船开枪，击中了一个渔民的头部致死，日本舆论群情汹涌。2012年3月，新当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愿

¹ 参见《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8页。

² 伊图鲁普岛约3200平方公里，库纳施尔岛约1500平方公里；施科坦岛约250平方公里；赫巴马伊群岛约100平方公里。

意归还赫巴马伊群岛和施科坦岛，日本仍要求四岛全部归还而再次拒绝。

“争议领土”的范围是事关两国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日本一直视四岛“被占领土”，前苏联和俄罗斯倾向于认为“争议领土的范围”只包括较小的两个岛屿赫巴马伊群岛（齿舞群岛）和施科坦岛（色丹岛），而另外两岛不在内；戈尔巴乔夫访日时也曾短时间内承认过四岛为争议领土，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方面旋即改换了口径。由于任何一方都不妥协，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难以找到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2010年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采取日渐强硬的措施，意在凭借岛屿争端谋取政治外交乃至战略收益，这一政策走向与俄罗斯在东北亚提升地位和扩大影响力的政策目标高度一致。

表现之一是领导人不断登陆争议岛屿，强化实际控制的事实与主权宣示。2010年11月1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南千岛群岛中的库纳施尔岛，日本深感震撼，并表示抗议。2011年1月，俄罗斯政府派出由多名政府高官组成的考察团再次登陆南千岛群岛，争端进一步升级。2012年7月3日，梅德韦杰夫以俄罗斯总理身份再度登上库纳施尔岛视察，日本政府表达不满。

表现之二是强化军事部署。2012年10月22日，俄罗斯国防部称，俄未来两年内将拨款近70亿卢布（约合2.25亿美元）用于建设南千岛群岛的驻军设施。2014年4月18日，俄军方表示，2016年前俄罗斯特种建设公司将在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与库纳施尔岛建成150多个军事设施。

表现之三是不断加大开发力度。利用南千岛群岛作为安全屏障、开发群岛本身及周边海域丰富的经济资源是俄罗斯南千岛群岛政策的基本内容。俄罗斯亚太经济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是更加重视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远东开发。2012年5月21日俄罗斯成立远东发展部，以利用南千岛群岛吸取亚太养料促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

四、真正的症结

领土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无论是前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还是过去与现在的日本在对待争议领土问题上都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结，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对外交决策产生压力。前苏联与日本、俄罗斯与日本有时能就是否存在“争议领土”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有时观点却截然相反。症结的核心在于选择哪一种国际法作为依据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日本依据日俄 1855 年签订的《日俄通好条约》、二战后 1956 年签订的《日苏联合宣言》等文件认定主权属于日本；前苏联与俄罗斯则依据《雅尔塔协定》、《旧金山和约》等文件认为南千岛群岛归俄所有是二战的胜利果实，不容改变。它们均无法在这一点上彻底说服对方，于是是否存在“争议领土”就成为两国领土争端的焦点之一。

归根结底，俄日争议领土都不是两国历史上固有的领土，而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扩展带来的“战利品”或者说“历史遗留问题”。尽管争议岛屿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但相对于俄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与经贸合作，领土问题不致发展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程度。事实上，在争议领土背后，俄日两国还有共同的深层恐惧。任何一国在争议岛屿问题上松口，都担心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现有的国土不稳固和可能接踵而至的分崩离析。“多米诺骨牌效应”系指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中，一个很小的初始能量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俄国最初只是一个在莫斯科附近的小国，其帝国的地位并不被欧洲承认。发生在 17 世纪俄罗斯的扩张，最终导致在 17 世纪中叶，在完全征服西伯利亚之后，俄罗斯的领土到太平洋和左岸乌克兰。19 世纪全盛时的疆域北起北冰洋、南达黑海南部、西起波罗的海、东达阿拉斯加，包括了整个中亚、波兰、芬兰和阿拉斯加。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国土面积有 2200 万平方公里，占地球面积 1/6。若争议岛屿问题处理不当，俄罗斯担心境内的加盟共和国或少数民族聚居区会争取独立，通过《瑛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领土 100 多万平方公里，还不

包括大面积海疆。二战后，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一方面不承认清政府与俄国签署的不平的条约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放弃了对沙俄侵占的大兴安岭以南和黑龙江流域中国领土的声索。

日本明治维新后才正式开始在北海道的开拓，1874 年借口琉球漂流民被杀一事出兵中国台湾，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吞并琉球，后来又侵占台湾、澎湖列岛、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侵华期间一度占领大半个中国，侵占东南亚等太平洋地区。若争议岛屿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日本则可能担心琉球（现冲绳）、北海道等未得到平等对待或者遭受掠夺性开发的地域的人民觉醒，或许会有独立要求，甚至担心俄罗斯可能吞并北海道，琉球会寻求与中国合并等小概率事件的发生。

五、中国的应对方策

虽然俄日两国均就争议领土问题表明过态度，也均提出过解决方案，但二者迥异程度南辕北辙，短时期内难以达成统一意见。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地区政治力量也会利用诉诸法律程序、开展政治抗议等方式压缩本国政府在岛屿争端上向对方让步的空间。由于争议岛屿事实上处于俄罗斯的实际控制下，并且在现今的俄日关系中，日本对于俄罗斯的需求远远大于俄罗斯对于日本的需求，俄罗斯方面的态度有逐渐强硬的态势。

国际舆论方面，1945 年日本投降后到旧金山和约签订近十年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美国、英国、中华民国等国政府都不否认南千岛群岛划归苏联。美国不希望因过多地介入俄日岛争而影响俄美关系的全面重启，明确表示宣称《美日安保条约》不包括北方四岛。

由于时效性限制以及二战后形成的国土规模与国际格局等复杂状况的综合作用，中国在政府层面目前不适合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声索主权，同样也不适合俄日岛屿争端问题上选边站队。尽管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中日友好期间曾支持日本要求返还四岛运动，曾发表《日本

人民要求归还北方四岛的正义斗争》¹等文，但需考虑当时中国与苏联两党、两国非正常关系的历史背景。目前则倾向于持中立观点，实属既有切肤之痛但又有难言之隐的无奈之举。因为历史对于旁观者不过是一段故事，但对于亲历者而言，却是切身的喜悦或感伤的深刻印痕。

但全体中国人有必要在一点上保持警醒，那就是二战结束至今不过区区六十余年，弥散在人们心灵与脑海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日本已经迫不及待地妄图篡改历史、否定二战确立的新国际秩序，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日本对其侵略战争给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乃至世界造成的灾难不仅不反省，反而念念不忘其帝国时代的所谓“辉煌”，军国主义大有死灰复燃之势。与周边国家的岛屿之争充分说明日本不甘接受战败的命运，其亟于改写东北亚国际格局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由于日本缺乏制约俄罗斯的有效手段，日本在俄日岛屿争端中处境被动。日本政府一直坚持解决北方四岛归属问题是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前提条件，所以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俄日难以签订和平条约。为化解国内政治压力，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在钓鱼岛争端中表现强硬来回应和转移国内批评。这种赌徒心理不仅不会对俄日领土争端产生积极影响，反而已然显示疲于应付的颓势。中国只需顺势而为，借力打力，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日本必将像风箱里的老鼠一样陷入自己选择的“南北受困”的被动局面中无法自拔。

¹ 《人民日报》1974年6月21日刊载。

明朝的御倭赏格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郑洁西

前言

有明一代，“南倭北虏”是困扰明朝的两大政治问题。“北虏”系指元灭明兴之后遁居长城以北的蒙古部落，“南倭”则指的是元末以来频繁侵扰明朝东部沿海的日本武士、浪人以及与之相勾结的中国海盗。自明初迄明末，倭患几与明朝相始终。倭寇活动的范围北起辽东，南至广东，在嘉靖中后期甚至屡屡深入内地劫掠肆虐，极大地破坏了明朝的社会稳定 and 经济发展。

作为抵御倭寇的重要政策，明朝自建国初年就已经草创御倭赏格，至嘉靖朝，因为倭患的愈演愈烈，明廷开出重金悬购倭寇首级。万历年间，随着倭患形势的消长进退，明朝政府于万历四年（1576）和万历十二年（1584）分别对御倭赏格作了重大调整。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决定出兵救援，并制定了悬购丰臣秀吉等倭酋首级的特殊赏格。有关明朝的御倭赏格制度，管见所及，学界迄无专文研究。¹拙稿试对明朝的御倭赏格做一整体考述。

一、明朝初期的御倭赏格

关于明朝的赏格制度，万历《大明会典》谓“国初论功行赏，皆临时取旨，差次重轻，不预为令。承平以来，意存激劝，率以首功定赏格，

¹ 张剑在《明朝军功制度初探》一文中曾指出明朝的“首功制”束缚了明军的抗倭战斗力，但他对明朝的御倭赏格并无考究。参见张剑：《明朝军功制度初探》，《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8卷第4期，2005年12月，第20-21页。

条例渐广”¹，指出明朝主要是以将士所斩获的敌人首级定其功次。

作为抵御倭寇的重要政策，明朝政府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草创御倭赏格。明朝政府后来不断继承和调整御倭赏格，其目的在于从战略上确保了这一抵御倭寇的重要激励机制。明朝御倭赏格的变迁，反映出倭患在明朝的消长进退。

明朝御倭赏格的制定，可以上溯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是年正月，太祖朱元璋颁布了如下一则御倭升赏条例：

定擒获倭贼升赏格。凡各卫指挥获倭船一艘及贼者，僉事升同知，同知升指挥使，仍赏白金五十两，钞五十锭。千户擒获者升指挥僉事，百户擒获者升千户，其赏俱与指挥同。在船军士能生擒及杀获倭贼一人者，赏白金五十两。将校、军士与倭贼陆地交战，能生擒或杀获一人者，赏白金二十两，钞二十锭。²

太祖下令，俘获倭船并倭寇者，卫指挥升一级（指挥僉事升指挥同知，指挥同知升指挥使，俱升一级），并赏银五十两，钞五十锭。所千百户则可升两级（千户升指挥僉事，百户升千户，俱升两级），并可获得同等奖赏。至于擒斩每名倭寇的情况，水兵可获赏银五十两，陆兵的奖励额则定为银二十两，宝钞二十锭。³

永乐朝以后，因为明朝对倭寇活动的大力打击，以及中日之间册封朝贡关系的确认，中国沿海的倭寇行为渐次减少。但是进入嘉靖朝中后期，倭寇活动再次日见猖獗。

¹ 申时行：《大明会典》（《续修四库全书》791册）卷123“兵部六·功次·番贼功次苗蛮倭贼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² 《明太祖实录》卷244，洪武二十九年（1396）正月丁丑（十八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第3538-3539页。

³ 关于当时宝钞的价值，张廷玉撰《明史》卷78有“食货二·赋役”谓：“（洪武）三十年，……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的记录，由此可见，二十锭宝钞的价值在当时约相当于十两银子。在海上擒斩一名倭寇可获得50两银子（约值100石大米）的奖赏，在陆上擒斩一名倭寇则可获得约30两银子的奖赏。

二、嘉靖朝的御倭赏格

嘉靖三十年代是沿海倭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为了有效地抵御倭寇，明朝开始调整御倭赏格。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巡视浙江都御史王忬奏请、嘉靖皇帝批准的御倭赏格定为：

一、擒斩真倭从贼一人，赏银十五两，次从贼首，二十五两，渠魁五十两。

一、抢斩漳寇、海寇为从者，赏银三两，次刷贼首，五两，船主渠魁，二十两，酋首为众所服者，五十两。其夺获贼艘大者五两，中者二两，小者一两。俘获男妇每五名赏银一两。若诛戮所俘冒功，及邀杀来降者，治如律。

一、善用火器击杀舵工贼首，令其引遁，及击破寇舟于未接之先者，大舟赏银二十两，次者十两，小者五两，若有献奇取捷、批亢捣虚者，虽无斩获，并以功论。

一、临阵被创者，给银一两，被杀者，给银五两，复其家。有先登陷阵而死者，给银二十两。若哨守官督战，没于浑者，临时酌请恤典。……¹

这一御倭赏格，将倭寇身份划作“渠魁”、“次从贼首”、“真倭从贼”三个档次，其首级被分别标价为 50 两、25 两、15 两银子，藉此鼓励明军将士剿杀倭寇。另外，此赏格还对中国海盗也拟定了相应的悬赏额度。但是，此后的倭患不但未得消停，反而愈演愈烈，故明廷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再次颁布了重新调整后的御倭赏格：

凡水、陆、主、客、官、军、民、快临阵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三级，不愿升者，赏银一百五十两。获真倭从贼一名颗并阵亡者，升实授一级，不愿者赏银五十两。获汉人胁从贼一名颗者，升署一级，不愿者赏银二十两。

如在海洋遇贼，有能邀击沈溺船只，或追逐登山，使贼不得近

¹ 《明世宗实录》卷 393，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戊寅朔（初一日），第 6893-6894 页。

港，如贼已近港，有能奋勇堵截，使贼不得登岸，如贼已登岸，有能冲锋破阵，夺其声势，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被祸，或所部兵少而擒斩多者，均以奇功论。¹

王抒所提议的御倭赏格，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得到了重大调整。每名倭寇首级的悬赏额，较三年前的赏格翻了三倍。如擒斩一名“真倭贼首”，其悬赏额由原来的银 50 两涨至 150 两，擒斩一名“真倭从贼”的赏银也由原来的 15 两升到了 50 两。对于倭寇中的“汉人胁从贼”，嘉靖三十二年（1553）赏格的悬赏额仅为银 3 两，嘉靖三十五年的赏格则对之开出了“升署一级，不愿者赏银二十两”这一高额悬赏价。另外，新定赏格还特设“奇功”²之项，鼓励明朝将士在海洋上消灭倭寇。

表 1 嘉靖三十年代“御倭赏格”每倭级悬赏情况一览表

时间	真倭贼首	真倭从贼首	真倭从贼	汉人胁从贼	其他
嘉靖 32 年	银 50 两	银 25 两	银 15 两	银 3 两、5 两、20 两、50 两不等	略
嘉靖 35 年	升实授三级，或银 150 两		升实授一级，或银 50 两	升署一级，或银 20 两	奇功

嘉靖三十五年（1556）御倭赏格的调整幅度，在明朝的赏格史上是规模空前的。《明史·兵志》谓“世宗时，苦倭甚，故海上功比北边尤为最”³，即指此嘉靖三十五年对倭寇首级的悬赏额度之高，甚过明朝最大威胁的北虏鞑鞑。此外，除了上述的赏格调整之外，为了尽早消弭倭患、最大限度地打击倭寇，明廷甚至还开出重金厚爵悬赏倭寇头目王直等人的首级：

兵部议覆赏格，宜如宣大例，有能擒斩王直来献者，封以伯爵，

¹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 123“兵部六·功次·番贼功次苗蛮倭贼附”，第 234-235 页。

² 关于“奇功”，《大明会典》卷 123“兵部六”谓“奇功不必看验首级，量贼之多寡，捷之大小，具奏超格升职，有世袭字样，准与世袭。”可见，奇功所获升职，可得世袭，较其他功次要丰厚得多。

³ 张廷玉：《明史》卷 92“兵四·赏功”，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261 页。

赏银一万两，授坐营坐府职衔管事，有斩获党酋如明山和尚辈者，授指挥僉事，赏银三百两。¹

嘉靖三十年代明朝御倭赏格的调整，以及开出重金厚爵悬购王直等人首级，一方面体现了嘉靖朝倭患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明朝抵御倭寇的决心和力度。

此后，在包括调整御倭赏格在内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为害甚烈的浙直倭患渐被肃清。嘉靖三十九年（1560），淮扬巡抚唐顺之条上“海防善后事宜”疏，请求“更立赏格，凡海中迎斩新倭一人，即给银二十五两以示优异”²，于此可见，原定的嘉靖三十五年（1556）御倭赏格似因倭患的基本消弭而不再实施。

三、万历朝御倭赏格的调整

万历初年，中国沿海的倭患发生了重大转移，浙直、福建的倭患基本消弭，但两广沿海的倭患却颇为严重。伴随着倭寇活动的进退消长，明朝相应地不断调整其御倭赏格。万历四年（1576），明廷颁布了两广总督凌云翼所呈请的御倭赏格：

水陆各路主客官军民快人等，如遇倭贼聚至五百名以上，我兵数仅相当，有能冲锋陷阵，一鼓荡平，或以寡击力战成功者，列为第一等，内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三级，不愿升者，赏银一百五十两。获真倭从贼首一名颗者，赏银十五两。

如贼数不多，易于取胜获功者，列为第二等。内获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一级，不愿升者，赏银五十两。获真倭从贼一名颗者，赏银十两。

若贼徒分伙疏劫及败遁零星，擒斩者列为第三等。内获有名真

¹ 《明世宗实录》卷 425，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乙亥（十三日）条，第 7360 页。

² 《明世宗实录》卷 480，嘉靖三十九年（1560）正月丙子（初十日）条，第 8018 页。

倭贼首一名颗者，赏银二十五两，不愿赏者，升署一级。获真倭从贼一名颗者，赏银五两。

凡阵亡者，升一级，获功另叙。

如汉人勾引倭夷为患积恶著名者，其罪较之有名倭首尤为深重，比照前项擒斩真倭贼首等贼一体升赏。¹

这一御倭赏格的调整，首次在明朝抗倭史上提出了三等赏格功次，按照倭寇入侵规模情况，重新确定了奖赏的等级和额度。比照嘉靖三十五年（1556）所定的御倭赏格，此次新定赏格的悬赏额度有所下降。譬如第一等功，斩杀“真倭贼首”的奖赏虽然与嘉靖三十五年的规定一样，但是斩杀一名“真倭从贼首”的奖赏额却由银 50 两降回到了银 15 两。其他第二等、第三等功的奖赏，下降幅度则更为明显。这一变化，显然归因于当时倭寇势力及其活动的弱化。

表 2 万历四年“御倭赏格”每倭级悬赏情况一览表

等次	条件	真倭贼首	真倭从贼首	真倭从贼	汉人勾引者
第一等	倭 500 名以上	升实授三级，或赏银 150 两	赏银 15 两		汉人勾引为患积恶著名者，比照真倭一体升赏
第二等	倭数不多	升实授一级，或赏银 50 两		赏银 10 两	
第三等	分伙倭或零倭	升署一级，或赏银 25 两		赏银 5 两	

万历四年（1576）对斩杀“真倭从贼”未作升职方面的规定，这一制度上的漏洞，在万历六年（1578）得到了填补。是年九月，明廷颁布了关于斩获“真倭从贼”的升职规定，对万历四年的御倭赏格做了如下的补充：

定海洋擒斩倭功，不拘外洋登岸，贼至五百名之外，船至十只以上，为一等，所获真倭从贼一名颗，升署职一级，二名颗升实职

¹ 《明神宗实录》卷 49，万历四年（1576）四月庚寅（二十七日）条，第 1138-1139 页。

一级，获汉人胁从贼三名颗，升署职一级。贼至三百名之外，船至五只以上，为二等，所获真倭从贼及汉人胁从贼各以名颗多寡上下其赏。或败后散遁零星擒斩者，各赏有差。着为定例遵行。¹

万历四年（1576）所定的御倭赏格虽然是针对两广倭患而制定的，但是这一最新赏格具备普遍的适用性，它在当时被援用于发生抗倭活动的其他沿海地区。万历六年（1578）十一月的南直隶擒斩倭寇功，即是以万历四年的广东御倭赏格为标准而进行叙录的。²

此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明廷重新调整制度，将万历前期的御倭赏格最终定型。今将当时的赏格内容移录于下：

定贼七八百人至千人，船十余只至二三十只，擒斩有名大贼首一名颗，升实授三级，不愿升，赏银一百五十两。擒斩真倭从贼一名颗，升实授一级，不愿升，赏银五十两。擒斩汉人胁从贼一名颗，升署职二级，不愿升，赏银二十五两。若二名颗者，当一级。以上为第一等。须贼势大举，血战成功者，方许开列，其余不得擅拟。

贼至三百人之外，船至五只以上，擒斩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一级，获真倭从贼一名颗，赏银十五两，每三名颗当一级，不及数者，给赏，获汉人胁从贼一名颗，赏银十两，多者加赏，不升。以上为第二等。须对阵击杀，两相鏖战者，方许开列。

如贼不过百余人，船不过一两只，贼首不过一船，立能斩获一名颗者，赏银十五两，真倭从贼一名颗，十两，汉人胁从贼一名颗，五两，通不议升，以上为第三等。³

表3 万历十二年“御倭赏格”每倭级悬赏情况一览表

等次	条件	贼首	真倭从贼	汉人胁从贼
第一等	倭700-1000人，	升实授三级，或赏	升实授一级，或赏	升署职二级，或赏银

¹ 《明神宗实录》卷79，万历六年（1578）九月壬戌（十四日）条，第1695页。

² 《明神宗实录》卷80，万历六年（1578）十月丁未（三十日）条，第1722页。

³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3“兵部六·功次·番贼功次苗蛮倭贼附”，第235页。

	船 10-30 只	银 150 两	银 50 两	25 两（二名颗升一级）
第二等	倭 300-700 人， 船 5-10 只	升实授一级	赏银 15 两 （三名颗升一级）	赏银 10 两，不升
第三等	倭 100 余人，船 1-2 只	赏银 15 两，不升	赏银 10 两，不升	赏银 5 两，不升

比照万历四年（1576）的御倭赏格，万历十二年（1584）新定赏格对三等功次的条件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且其条件要求较万历四年的规定要高，但是对擒斩“真倭从贼”的奖赏，则以后者更为优厚。两种御倭赏格，在悬赏额度上各有升降，但是新定赏格的规定要更为审细可行。

万历十年以后，明朝沿海地区几乎不再出现倭寇入侵事件。万历十九年（1591），因为传言日本丰臣秀吉将要侵犯大陆，福建巡抚赵参鲁在本区新定水陆军令。该份水陆军令中关于倭寇首级悬赏额度的规定，反映出了万历十年代后期明朝的御倭赏格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调整：

一、水兵以冲没贼船为上功，不论首级多寡，然须有生擒及首级器械船只为验，每沉一船，赏银四十两；陆兵以生擒为上功，首级次之，但有对阵生擒贼首一名，无分员役，赏银十二两，真贼一名八两，从贼五两，首级递减二两，渔船乡夫并照此例。¹

在万历十二年（1584）至少赏银 10 两的真倭首级，到万历十九年（1591）倭寇报警时仅规定为赏银 6 两（生擒则为 8 两），倭寇首级的悬赏额在明朝赏格史上可以说跌入了最低点。这说明倭寇势力的消长进退，最直接影响着明朝御倭赏格制度的变迁。

四、万历二十年的特殊赏格——明朝开出重金厚爵悬购丰臣秀吉首级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丰臣秀吉突发大军侵犯朝鲜。承平日久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战国乱世的日本锐卒，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月之内，首都汉城（今首尔）沦陷，两月之后，其北方重镇平壤亦落入敌手。响应濒临亡国的朝贡属国朝鲜的求救，中国的明朝政府作出了

¹ 万历十九年八月刊“钦差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赵为军务事”，《玄览堂丛书续集》第四册所收，[台北]中正书局，1958年，第603-604页。

出兵援助的决定。当时即将在朝鲜战场发生的中日冲突，在概念上其实已经脱离了“倭寇战争”的模式，以国家为主体的战争格局开始浮出东亚国际关系的水面。在这一背景下，明朝制定特殊赏格，开出重金厚爵悬购丰臣秀吉首级。

其实，早在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战争前夜的万历十九年（1591），明朝就得到了日本企图侵犯大陆的各种情报。¹这些情报引起了整个明朝朝野的震动，迫使其作出相应的攻守战略。²其中的对策之一，就是制定特殊赏格悬购丰臣秀吉首级。时任两广总督的刘继文早在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就向万历皇帝提出了诱使葡萄牙人擒斩丰臣秀吉的策略：

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约，……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澳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³

刘继文的提议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允准，但现有史籍未见明廷或两广地方政府与葡萄牙人交涉的相关记载。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否响应明朝的征讨日本号召尚未可知。

明朝正式提出悬购丰臣秀吉首级这一特殊悬赏令，当在次年（1592）后者出兵侵略朝鲜之后。是年七月十八日，明廷召开了一场讨论日本侵略朝鲜战事的“五府九卿科道”会议。⁴会后，兵部初步制定了具体的悬

¹ 见侯继高撰《全浙兵制》第二卷附录《近报倭警》。关于这些情报的专门研究，请参考松浦章的《明代海商と秀吉“入寇大明”の情報》（末永先生米寿纪念会编《末永先生米寿記念献呈論文集》坤，奈良明新社，1985年，第1717—1743页），米谷均的《〈全浙兵制·近報倭警〉にみる日本情報》（《8—17世紀の東アジア地域における人・物・情報の交流—海域と港市の形成，民族・地域間の相互認識を中心に—》，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2004年，第125—142页）等论文。

² 郑洁西：《万历朝鲜之役前夜明朝对日本的攻守战略》，张伟主编《浙江海洋文化与经济》第三辑所收，海洋出版社，2009年8月，第20—29页。

³ 《明神宗实录》卷242，万历十九年（1591）十一月壬午（二十日）条，第4520页。

⁴ 《明神宗实录》卷250，万历二十年（1592）七月癸未（二十六日），第4665页。石星：《议征倭疏》，徐亮辑《万历疏钞》（《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0册）卷43“东倭类”所收，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9—41页。

购丰臣秀吉首级方案：

兵部一本“倭情变诈日增，势益猖獗，万分可虞，恳乞圣明早赐议处以伐狂谋，以图治安事”，……再照戡祸定乱，虽臣子致身之忠，而懋赏酬功，实大君御世之典，故以啖刘么么小丑，尚不吝封拜之条，以激忠烈，今倭奴拥数十万之兵，其势孰与啖刘，据朝鲜之众，其志孰与啖刘，乘舟遇风，瞬息千里，其便利孰与啖刘，万一狂逞，震惊陵京，其重孰与啖刘，则大议封赏以示鼓励，胡可缓者。今此征讨，必须先得平壤，方可渐复王京，成功固有次第，悬赏亦有差等，合无昭示远近，若能恢复平壤城，令朝鲜王守之，则倭无由至天津，而已固我之门庭矣。其文武诸臣，临时从优升赏，若有擒斩倭酋关白平秀吉、妖僧玄苏等，及恢复朝鲜国者，赏银一万两，封伯世袭。其见有侯伯世袭者递，递为公侯，皆世袭之。如在倭中有系中国之人能反邪归正，或擒平秀吉等来降，一体封拜受赏，其率众来归者，皆授以官爵。庶上悬不次之殊恩，下奋直前之勇敢，大捷可期矣。¹

兵部提出，本朝文武官员若能擒斩丰臣秀吉并恢复朝鲜领土，将受到赏银万两、封赐伯爵的重大嘉奖，在日明人若能同样擒斩丰臣秀吉，亦将受到同等待遇。这一悬赏丰臣秀吉首级方案，很快就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允准。²

此后，鉴于这一赏格方案的对象范围过小，当年九月刚刚被任命为蓟、辽、保定、山东四省“防海御倭军务”³经略大臣的宋应昌于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底再次上书兵部，建议调整这一赏格，增加悬赏对象：

一为议增赏格以鼓士气事。案照先该本部题奉钦依，有能擒斩关白平秀吉，妖僧玄苏者，赏银一万两，封伯世袭，已经颁行。去后近该本部行至辽阳，节差原任同知郑文彬等会同朝鲜国王遣差侦

¹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附·部垣台谏条议疏略”，第18-19页。

²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附·部垣台谏条议疏略”，第19页。

³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救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第6页。

探人等备察倭情，随据各官行据朝鲜回称，关白平秀吉年老无子，尚在海外固守巢穴，以为众倭根本，其侄平秀次袭位领兵，见驻对马岛中，自称大阁，未以为众倭声援，大将平秀嘉据王京一带，以捣朝鲜腹心，裨将平秀忠据庆尚一道，以扼朝鲜咽喉，平行长，平义智，平镇信，各号先锋，犄角平壤，以规进取，妖僧玄苏并其徒宗逸咸称军师，执筹平壤，以佐元凶等情到部。为照倭奴猖獗，占夺朝鲜，且声言入犯，而群贼或为主，或为辅，或为将为谋，均皆神人所共嫉，天讨所必诛者，观倡乱之罪既无重轻，则议赏之格宜无轩轻，乃今倭酋姓名显著者九，而余者尚多，载在赏格者二，而遗者尚七，今当征进之期，拟合咨请酌定赏格，以鼓士气。为此合咨本部，烦为裁示，或行题请，将擒斩秀次、秀嘉等七倭酋或如擒斩关白、玄苏之例，或别为定拟，希咨知会者，令各该将吏士卒一体遵奉鼓舞，务期奋勇殄灭倭丑施行。¹

宋应昌提议，除了丰臣秀吉和景辙玄苏这两名最大“倭酋”之外，另外还有七名重要的日本侵略军头目，对于他们的首级，朝廷也应给予适当的悬赏，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鼓舞明军士气。宋应昌的提议，经兵部的转奏，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允准：

兵部题：“关白平秀吉倡乱元凶，妖僧玄苏实为谋主，有能擒斩二贼来献者，照前议通候重赏外，平秀次既承秀吉，有能擒斩者，与斩秀吉同赏。其斩平秀如、平秀忠、平行长、平义智、平镇信、宗逸者，赏银五千，世袭指挥使。若海外各岛头目有能擒斩各贼来献，许即封为日本国王，仍加厚赉。”奉旨：“赏格部议已定，着略并各镇及朝鲜等处宣示军中，仍行各省直通谕海外诸国遵照，共图剿灭凶残，各安境土，成中外荡平宁辑之治。”²

万历皇帝批准了兵部增加七名“倭酋”首级悬赏对象的奏请，另以册封日本国王为筹码，利诱日本国内发生火并，并下令将此新定赏格颁向援

¹ 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卷3“移本部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第68页。

² 《明神宗实录》卷255，万历二十年（1592）十二月庚子（十四日），第4743页。

朝明军、国内各军镇、朝鲜国以及其他海外各国，以期促成威胁丰臣秀吉的最大可能。如此高规格、大范围地重金厚爵悬购丰臣秀吉及其将领首级，在明朝的赏格史上可谓规模空前，这反映出倭寇势力的消长进退，最大程度上影响着明朝御倭赏格的变迁。明朝制定特殊赏格悬购丰臣秀吉等人首级，在作战激励制度上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作了准备。

表 4 丰臣秀吉及其侵朝军将领赏格情况一览表

次序	赏格对象	被悬购者身份	悬赏额	其他
1	平秀吉 (丰臣秀吉)	太阁、日本前 关白	银一万两，封 伯爵世袭	若海外各岛头目有能擒斩 各贼来献，即封为日本国 王，仍加厚赏
2	玄苏 (景辙玄苏)	外交僧，侵朝 军第一军参谋	银一万两，封 伯爵世袭	有能生擒来献者，每名除 新例赏格外，仍加赏银一 千两
3	平秀次 (丰臣秀次)	关白	银一万两，封 伯爵世袭	
4	平秀嘉 (宇喜多秀 家)	侵朝军第八军 统帅	银五千两，世 袭指挥使	
5	平秀忠 (丰臣秀胜)	侵朝军第九军 统帅	银五千两，世 袭指挥使	
6	平行长 (小西行长)	侵朝军先锋， 第一军统帅	银五千两，世 袭指挥使	有能生擒来献者，每名除 新例赏格外，仍加赏银一 千两
7	平义智 (宗义智)	侵朝军第一军 将领	银五千两，世 袭指挥使	
8	平镇信 (松浦镇信)	侵朝军第一军 将领	银五千两，世 袭指挥使	
9	宗逸 (竹溪宗逸)	玄苏弟子，侵 朝军第一军参 谋	银五千两，世 袭指挥使	

据宋应昌撰《经略复国要编》卷 13 “移本部咨（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三十日”条、《明神宗实录》卷 155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庚子（十四日）”条整理制作而成。

结语

明朝御倭赏格的变迁，反映出倭患在明朝的消长进退。明朝政府不断继承和调整之前的御倭赏格，其目的在于从战略上确保了这一抵御倭寇的重要激励机制。万历前期的倭患相对轻微，御倭赏格的悬赏额度渐次降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丰臣秀吉侵犯朝鲜，明朝决定出兵救援。当时即将发生的中日战争，在概念上其实已经脱离了“倭寇战争”的模式，以国家为主体的战争格局开始浮出东亚国际关系的水面。在这一背景下，明朝开出重金厚爵悬购丰臣秀吉首级。这一制定特殊赏格的御倭战略，反映出倭寇势力的消长进退，最大程度上影响着明朝御倭赏格的变迁。明朝制定特殊赏格悬购丰臣秀吉等人首级，在作战激励体制上为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作了准备。

《崔溥〈漂海录〉评注》注释指瑕一则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张新朋

葛振家先生所撰《崔溥〈漂海录〉评注》¹（下文称“《评注》”）是我们研读崔溥《漂海录》的重要参考书。是书为葛先生积十数年之功整理而成，对于我们理解《漂海录》有莫大的帮助。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其中的某些注释并非十分准确。下面仅就葛先生书中“初丧”一词的解释，略加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初丧”一词，在《漂海录》中出现4次，分别为：

1. 闰正月初四日 叫谓军人等曰：“我奔初丧，情不可稍留，人或有助之行。为人子者，其可顷刻濡滞乎？”²

2. 四月初一日 臣曰：“我奔初丧，一日作客³，如过三秋，请足下图我速还。”⁴

3. 四月二十日 翔曰：“你在宾侧，则尔父为重，今在于此，知有皇帝而已。皇帝有恩⁵，若不往谢，大失人臣之礼。故我中国礼制，宰相遇丧，皇帝遣人致赙。则虽在初丧⁶，必具吉服，⁷驰入阙拜谢，然后反丧服。盖以皇恩不可不谢，谢之则必于阙内，阙内不可以衰麻入，此嫂溺援手之权也。你今从吉，事势然也。”⁸

4. 四月二十三日 臣曰：“我奔初丧，漂寄他国，情理甚切，一日

¹ 线装书局，2002年10月。

² 《评注》第35页。

³ 《评注》“客”下无标点，今予以点断。

⁴ 《评注》第147页。

⁵ 《评注》“恩”下无标点，今予以点断。

⁶ 《评注》“丧”下无标点，今予以点断。

⁷ 《评注》“驰”下无标点，今予以点断。

⁸ 《评注》第147页。

之过，实同三秋。昨者病今日少愈，车上卧在，可以去矣。请行。”¹

例一之“初丧”，葛先生注释云“第一次居丧”。将葛先生之释义放入句中，则为“我奔第一次居丧”，显有不通。今按：此句“初丧”之“初”以释作“刚刚、方才”为优，“初丧”谓“刚刚发生的丧事”、“新近发生的丧事”。弘治元年（1488）正月三十日崔溥得家奴莫金之报，知父亲去世，闰正月初三日即乘舟由济州发往罗州。上引“我奔初丧”云云，乃船发出后次日即初四，在海上遇风暴，随行部分军人认为必死无疑故不全力排险，懈怠以对，崔溥劝说众懈怠军人之语之一部分。由时间上来讲，初四与正月三十仅隔三天，故可曰“初丧”。下文闰正月初五日，崔溥向上天祷告云“葬臣新死之父，养臣垂老之母”²；二月二十三日，崔溥答扬州卫百户赵鉴云“父新死未敛，母垂老在堂”³；三月二十九日，崔溥答何旺曰“且父新死⁴，母当丧，弟又少不更事”⁵，凡三次使用“新死”，亦可证明父丧是发生不久的事情。例二、例三、例四之“初丧”亦当作“刚刚发生的丧事”、“新近发生的丧事”解。

¹ 《评注》第 160-161 页。

² 《评注》第 37 页。

³ 《评注》第 115 页。

⁴ 《评注》“死”下未点断，将本句与“母当丧”作一句读，不妥，今予以点断。

⁵ 《评注》第 145 页。

通知公告

第八届中国高校教师“日本历史文化”高级讲习班通知

为了提高中国日本学研究水平，交流学术信息及研究成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海外日本研究重点支援机构”——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联合，自2007年度开始已成功举办七届中国高校“日本历史文化”高级讲习班，受到学界内外一致好评。在国内外界广泛关注和热情支持下，第八届高级讲习班将在西北大学举办，兹面向全国招聘学员。具体通知如下：

一、招聘对象及条件

在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高校（包括研究机构）从事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史教学及研究的教师和研究人員，应聘者一般应具有硕士学位（特殊情况条件可以放宽）。已经或准备开设日本文化、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概况等课程者优先；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45岁（特殊情况条件可以放宽）。可以用日语自由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二、招聘人数

共30名，原则上每个单位1名。在承办单位经费允许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加5-10名本地学员。

三、时间与地点

时间为2014年8月17—26日，地点为西北大学（西安市）。

四、讲习班形式

1. 专家讲座：讲习班期间安排6-8次讲座，内容涉及日本社会、文化、历史及中日关系史等课题；
2. 学员讨论：围绕某一专题开展讨论，包括学术热点、教学方法、研究动态等；
3. 发表论文：精选学员提交的论文若干篇进行大会交流；

4. 参加西北大学举办的“古代长安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5. 史迹考察：讲习班期间安排参观西安附近有关的史迹考察。

五、应聘方式

应聘人员须填写《中国高校教师“日本历史文化”高级讲习班申请表》，有意发表学术报告者请将申请表和学术论文全文或摘要以电子邮件或书信形式提交主办方。主办方组委会将根据申请表和提交论文严格筛选，发出正式通知。

六、截止日期

烦请填写下列《报名表》，务请于2014年6月10日前寄至会务组；有意发表者请撰写1000字左右论文概要（word文档），于2014年6月10日前寄至会务组。（欢迎用电子邮件联系，地址：zhusyaei@hotmail.com。会务组收到的报名表、论文概要后必回复确认，如一周内未收到确认邮件，烦请重新发送。）

七、学员义务

1. 学员无需缴纳学费。交通费自理，每人每天100元（含食宿费、考察费，差额部分由主办方补贴）。

2. 部分学员将就自己提交的论文（或研究专题）做一次主题发言，时间为20-30分钟；

3. 提交论文在讲习班发表后，经评定达到相应学术水准者，将予推荐刊登在《日本思想文化》、《东亚研究》等学术杂志。

4. 学员必须遵守讲习班组织纪律，不得无故缺席讲座和讨论会。讲习班结束时颁发证书。

八、主讲名师一览表（暂定）

李薇（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勇（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院长、教授）

铃木靖民（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

後藤昭雄（日本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高兵兵（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维坤（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九、联系地址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联系人：谢咏，邮编：310016，电话：0571-8806773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14 年 2 月 20 日

本院动态

我院张新朋副教授所著《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2013 年度优秀图书奖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获悉，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从该社 2012. 2013 两个年度所出版的近 3000 种图书中，筛选出优秀图书 38 种，授予该社 2012-2013 年度优秀图书奖。我院张新朋副教授所著《敦煌写本〈开蒙要训〉研究》喜获该奖。



我院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联合开展加拿大国家科研项目（SSHRC）申请

日前，在王勇教授的领衔主导下，东亚研究院开展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联合开展加拿大国家科研项目（SSHRC）申请，主要参与有关东亚佛教文化交流方面的科目研究。该项目跨越欧亚，全球 30 多所的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都参与其中。项目的主要开展方式包括：中国与加拿大高校之间开展的国际论坛互动交流，专家学者的访问等。其中双方研究生的互派交流是该项目的特色之一，对于我院与拓展与西方学界的学术交流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王勇教授，陈小法教授，肖平教授参与此项目外，还有 4 名研究生也参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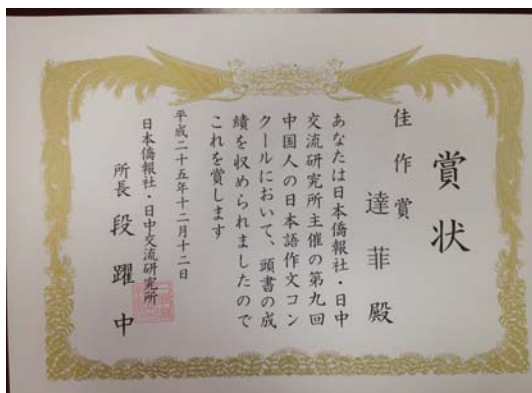
陈小法教授参加“纪念卫温船队从章安（台州椒江）远航台湾 1784 周年暨遗迹考古研讨会”有感

2 月 24 日，由浙江台州市卫温船队远航台湾研究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卫温船队从章安（台州椒江）远航台湾 1784 周年暨遗迹考古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内的启真酒店召开。浙江省人大原副主任吴国华、海协会副会长王在希、中纪委原委员冯寿森少将、台湾海峡两岸和谐文化交流协进会会长陆炳文、国防大学战略教研室朱成虎少将、浙江省台办主任裘小玲、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潘海生、台州市副市长董贵波、椒江区副区长李越等领导到会致辞。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中央党校、海军学术研究所、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社科院、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两岸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百余名领导、学者、专家、媒体工作者出席会议。我也应邀参加了本次大会。本次大会安排了七名专家和学者进行了研究发表，与会嘉宾就“钓鱼岛归属”、“台湾开发”、“台台（台州、台湾）交流”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根据“卫温远航台湾研究会”

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潘国平教授的研究，公元 230 年正月，卫温万人船队从台州的章安（现椒江）启程，浮海夷洲（台湾），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进行开发经营，是中国正史上关于大陆与台湾交往的最早记载，标志着两岸关系的开端，也标志着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自古属于中国的铁证之一。关于卫温远航的目的地“夷洲”到底是台湾还是现今的琉球群岛，其实学界存在着分歧，主张是后者的学者不在少数。我们认为，不管是台湾还是琉球群岛，卫温的远航与钓鱼岛的最早发现极有可能有很大关系。随着相关研究、考古的深入，相信文献、物证将进一步得到发掘和补充，为钓鱼岛归属中国提供更充分的证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分析，“卫温远航台湾研究会”举办的本次大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钓鱼岛归属中国的确切文献记载一般追溯至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而卫温远航台湾研究会的各项研究给钓鱼岛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我院也正在从事钓鱼岛文献及其归属等问题的研究，今后将与卫温远航台湾研究会等国内外研究机构携手合作，力争在钓鱼岛问题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我院研究生喜获“中国人日语作文大赛”佳作奖

由日本侨报社、日中交流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人日语作文大赛”，自 2005 年开始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九届。日本侨报社于 11 月 1 日在东京发表了第九届中国日语作文大赛获奖名单，111 名中国学子榜上有名。其中，我院 2012 级研究生达菲同学在本次大赛中喜获佳作奖。



日本影视巨匠小山薰堂应邀前来我校做讲座

2014年3月6日，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汤本裕纪副领事偕同日本著名综艺节目编剧、剧作家小山薰堂先生来访我院。副院长陈小法、办公室主任何晓威、韩国学研究所所长金俊等研究院老师首先陪同两位客人参观了我院。

随后学校外事处宋兴无处长、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郭爱昕书记、吴玲副院长及我院老师与两位日本客人进行了座谈交流。宋兴无处长、郭爱昕书记分别代表学校和学院讲了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小山薰堂先生和汤本裕纪领事也作了致辞，在对学校规模感到惊讶之同时，对我校的东亚研究水平和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许。

下午，在陈小法老师的主持下，我院主办的五洲讲坛之“日本影视巨匠谈日本”在下沙校区图书馆二楼报告厅拉开帷幕，来自校内外的五百名左右的师生济济一堂，来聆听小山薰堂先生的一家之言。



小山先生的讲演题目为“DESIGNING the PROJECT”，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新点子的启示都在日常生活中！”启示我们要善于在简单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新的创意，相信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成功的关键所在。此外还讲述了大家熟知的《入殓师》的创作经过，让大家对小山先生的创作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赢得了阵阵掌声。在讲座接近尾声时，小山先生播放了一段自己拍摄的视频，旨在启示我们“幸福不是

要去找的东西而是要去意识和发觉的”，在场师生无不受益匪浅。之后的互动时间，小山先生热心地解答了大家的疑问。

在讲座结束后，许多同学恋恋不舍，自觉排起队来，希望能得到小山先生的签名并与其合照，小山先生耐心地为大家签名并合照。

整个讲座由我院的金俊老师担任翻译。

日本早稻田李成市教授来我院做讲座

2014年3月14日晚，由我院主办的五洲讲坛之“何为东亚”，在日本文化研究楼302会议室成功举办。此次讲座，我院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学院院长李成市教授为大家带来题为“今なぜ「東アジア」なのか”的精彩演讲。演讲由我院韩国学研究所所长金俊教授主持，首先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了李成市老师及随行的两位老师。在李老师精心准备的演讲稿的帮助下，在场者基本能够很好地理解李老师的演讲。李老师说他这次发表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为帮助更好地理解日本研究，阐释“何为东亚”；其二，最近在韩国，“东亚”这一词汇不仅在研究方面成为日常用语，也被用于历史教育。接着围绕这两个目的，李老师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让大家对东亚又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李老师的发表结束后，同行的郑州大学副教授葛继勇老师对李老师的讲座做了简单的总结并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最后，进入互动解惑阶段。我院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点同李老师进行了交流，主持人金俊老师也就几个问题与李老师进行了沟通并交换看法。现场气氛很活跃，李成市老师一一进行了耐心的解答。讲座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随后，李成市老师一行同我院所有老师在日语文化研究楼一楼大厅合影留念。



我院在韩国蔚山大学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4年3月20日—23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韩国蔚山大学校日语日本学科、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东亚的灵魂观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蔚山大学校成功召开。

在会议开幕式上，陈小法老师代表我院致辞。会议发表的第一阶段的主旨为“东亚的灵魂观”，郑洁西老师作了题为《关于壬辰倭乱的灵异说》的发表；聂友军老师作了题为《林四娘形象与中国灵魂观——以〈红楼梦〉与〈聊斋志异〉为中心》的发表。第二阶段为基调讲演，金俊老师发表了《康有为的宗教观与孔教运动》为主题的讲演。第三阶段以“东亚文化与宗教”为主旨，陈小法老师作了题为《〈漂海录〉中崔溥与中国人的笔谈研究》的发表。在完成各项既定议程后，金俊老师代表我院致辞，研讨会圆满闭幕。

本次研讨会得到蔚山大学校、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日本早稻田大学综合研究机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大力支援，在此深表谢忱。会

议还决定明年选择适当时间在杭州再次召开中韩日三方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议题暂定为“东亚文化交流——以人员、物品的流通为中心”。

21日下午和晚上，我院全体与会教师利用会议间隙并挤出休息时间与专程从韩国各地赶来的数位知名学者座谈，研讨东亚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共商今后合作的大计。参加座谈的韩国学者有蔚山大学人文学院李钟书教授、国立庆尚大学人文学院张源哲教授、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所林东悦研究员、韩国交通大学社会福祉学科韩奎良教授、我院2013年度外籍专家、釜山大学史学科张东构教授、釜山教育大学吴仁泽教授。

22日中韩日三国与会学者一起参加了以“新罗与日本”为主题的文化考察，先后到石窟寺（1995年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佛国寺、天马冢、庆州博物馆和皇龙寺遗址等地进行了现场考察，切实感受古新罗的历史与文化，以及这一时期的韩国历史、文化与中国、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23日研究院参会代表一行拜会我院客座教授、蔚山大学鲁成焕教授和延世大学林志宣教授，就加强院际交流、充分发挥客座教授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坦诚的研讨。

24日研究院与会教师专程看望我院正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留学的张颖同学，转达了全院师生对张颖同学学习、



生活的关心，导师金俊老师在详细了解了张颖同学的毕业论文进展情况，并给出许多有益的指导与建议。

日本神奈川大学副校长铃木阳一教授和日本大妻女子大学的钱国红教授来我院作讲座



2014年3月28日由我院主办的“五洲讲坛”系列讲座第三讲成功举办，此次，我院很荣幸地请到了神奈川大学副校长铃木阳一教授和大妻女子大学的钱国红教授前来作讲座。讲座由我院院长王勇教授担任主持，向大家简单地介绍了两位老师，接着讲座正式开始。首先是来自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江户文人为何酷爱苏堤之柳”的精彩演讲。铃木老师的中文水平相当高，一口流利的中文让大家佩服不已，可见其对中国的认识之深。讲座中，铃木老师通过自己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对比了中日西湖图及日本西湖图随着时间的变迁的变化，特别是注意到日本也存在“潇湘八景”但其普及度却远不如中国，甚至一度出现各地的“潇湘八景”，直至后来的所普及，这一视角是新颖的，同时通过图片展示了一些珍贵的史料。通过分析得出了江户时代虽然有各方

面的局限，但中日之间的交流并没有中断，而是以其他方式在进行着，如各地出现的“潇湘八景”、“小西湖”、“苏堤”甚至“西湖堤”等即为明证，同时也说明江户时代的人们对海外优秀文化的憧憬与热爱，并努力地学习的精神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的。这也启示我们思考：对于过去的历史文化，我们要学习借鉴，为今所用。紧接着，来自大妻女子大学的钱国红教授开始了题为“日本研究的现代意义”的演讲。钱教授主要就“何为日本研究”、“我与日本研究”、“整理与思考”等几个方面阐释了自己与日本是如何结下不解之缘的，以及在此过程中自身思维方式的转变，进而研究方法的改进，同时也强调了日本研究的重要意义，鼓励后辈们要更加努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讲座进入互动环节，几位老师和同学就自己的研究方向及感兴趣的点进行了提问，得到了两位老师的耐心的解答，气氛很是活跃。最后王勇老师也谈了一些自己的感想，再次表示感谢，并希望两位老师能够经常前来为我们作讲座。